

在晚清小说中的医学再现：文化的隐喻

(Representations of Medicine and Cultural Allegory in some Late Qing Novels)

宇乐文 [法国-瑞士]

(Victor Vuilleumier, Université Paris-Diderot Paris 7 / Université de Genève)

Thought Paper for the Conference

« Popular Literature in Contemporary China: Production, Diffusion and Genres »

University of Geneva,

16-18 June 2017

中国现代文学（“现代”在这里指的是从19世纪的九十年代迄今）经常引用医学或科学的再现与形象来表达各种意义。尤其是医学，从维新思潮以来，包括在哲学家和知识分子那边，常常体现一种有关现代化主题的话语。因此，现代文学里面的医学再现，也相当重视研究中国现代化话语如何对待西学东渐，以及如何输入它。在20世纪二十年代的“新文学”里面，一些作家，像周作人、鲁迅、郭沫若等，都引用一系列来自西医的词汇与再现，为了将语言现代化，反对他们视作非科学和落后的人生观。他们似乎对医学本身较少地感兴趣：他们主要作为隐喻（现代化、政治活动或再教育，等等，参见譬如三四十年代的丁玲、巴金）来使用（医学再现甚至可以被反对，参见郭沫若的小说）。到了八十年代之后，医学经常作为政治、经济与历史现代化的暗喻，体现为一种忍受生命权利（*biopouvoir*）过程的经验（参见莫言或余华的一些作品）。其实把医学的文学形象当为现代化的主题化，早在晚清的“新小说”里，就已有之：本文有意于分析一下这种倾向。这也是王德威所讲的“被压抑的现代化”的另一种例子：新文学的作者与晚清通俗、或副文学（*paralittérature*）在这方面有着密切的关系。

然而，首先需要把医学再现、医生形象与疾病隐喻不同主题区分开。谭光辉的著作（《症状的症状：疾病隐喻与中国现代小说》）证明了中国现代文学里面疾病隐喻如何重要，意味着现代中国是西方与中国人自己眼中的“东亚病夫”的一种再现；再说，据他讲，“以医生的眼光来审视社会始于晚清”（第98页）：最明显的例子是《老残游记》或《医界镜》

（请看以下）。在鲁迅未发表《狂人日记》之前，疾病形象与疯狂及入梦主题已经组合在一起（比如参看《老残游记》、《痴人说梦记》或《月球殖民地小说》，看下文）。另外，一些资料专门研究古代与近代中国文学里面的医生形象。特别是《医界镜》，从一种社会学角度来看，它表现出明清时期中医所发生的变化与演变（请参看马金生，《从“医界镜”看明清时期民间的行医活动》、《明清时期的医病纠纷谈略》，王立、秦鑫《明清小说中的医者形象研究综述》）。

对于不同类型的医生（良医、神医、庸医、时医）的再现，并不是一个现代的主题。事实上，正如疾病的主题，在古代的文学中也可找到，这一点，整合在现代文学的社会于政治寓言的新语境之中，从19世纪末起，扮演了明显的重要的作用。此外，这部小说也充当一种教导性的功能，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医学再现在清末的通俗文学中的一种重要的维度（或者说面向），此外，这也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寓言性的、隐喻性的功能。

首先分析两篇选自《中国近代文学大系·小说集》第七卷的文本。第一篇是吴芴斤（吴焯昌）（1781-1856 ??）的《金山寺医僧》（来自《客窗闲话》续集卷4）。这篇属于“笔记”的类别；在故事中介绍历史上的医生叶天士（1667-1746）。这一篇小说里所表现的医生形象是良医和神医：叶天士愿意不显露自己身份而作为比他水平更高医僧的门生。两个医生体现的是中医的技术与智慧以及符合儒家伦理原则的行为。这部文本很乐观地承认某一种古典的道理，并不会否认或者带任何批判的态度。“医僧”说：“药如不能救病，圣贤何必留此一道[中医]？”（第480页）。另外，这篇笔记也起一种教导的作用：读者可以学到一点疾病的诊断法和治愈方式。

另一篇文本是闾异（生平不明）的《介绍良医》（《月月小说》第二年第九期，1908年）。它所显示的反话叙述模式赋予它以一种“现代”的维度：第一人称叙述者作为一个又可笑即消极的人物。他表现一个高层阶级吃喝玩乐的大少爷，也很势利：“我便和革命党倚仗外国人的接济一般”，可见，“革命党”也当这篇文本讽刺的目标。这个人物遇到一个外国“医生博士”，才知道他“脏腑有毒”，需要换新的。可是，按照外国医生的说法，既然所有中国人都有病，就不得不施行移植术，为叙述者一场“虎胆”来代替旧脏腑。然后让医生做手术：

博士便教我到他试验室去坐。我进去四面一看，是间小小精室，壁上刷着灰色的粉，靠东开了两个百叶窗。许多东西[。。。]摆了一世界也不知有甚么用处。只见他搬出一个长方形的木箱[。。。]正是那新发明的换脏腑的机器。我正要瞧瞧是个甚么奇巧的把戏，他早施展催眠术，将我迷得人事不省。[。。。]“先生这便是你的贵脏腑了。”我低头一看，果然是些冰凉的东西，用手摸摸肚皮，却已裂了一道，缝是用针线扎好的。外面束着一条皮带，倒也毫无痛楚。究竟不知博士弄的是甚么玄虚。

看官，我倘然对着人家说，是人面兽心，那人必定手舞足蹈的动气，因为这句话是表明行为不好的缘故。[。。。]其实我的行为，好也没好，我自己也不便说得，不过换了脏腑之后，想起往日所做的事，心里老大难过[。。。]。

这种文学表达的意义经常可以模糊，大致也是以娱乐为主罢。虽然如此，讽刺的针对还是比较清楚。首先涉及到叙述者。这种变化的过程起码有两层意涵：在中国古典文学中，虎和狼暗喻者腐败和残酷的官员；而外国医生把他当十足的“畜生”。另外，他受一种隐喻化的手术：叙述者得知他行为不道德。不过，这一场手术未成功，无法真正改变自己。之后，文本也讽刺作为崇拜及迷信外国人的叙述者。说不定巴金1931发表的《狗》与这篇有互文性的关系。第二个讽刺目标是外国医生：他做手术是为了要中国人的钱。他也很虚伪，说所有中国人脏腑有毒，其实也得承认国外也一样。不过主要是不知道医生究竟是否施行过手术：文本暗示着它本来是假的（“把戏”、“玄虚”）。愚蠢的叙述者上当受骗，外国医生博士毕竟是庸医。他实施的科学知识光是“催眠术”，隐喻着外国人操纵中国人士的意思。叙述者却有病，不过，似乎中国为完全“东亚病夫”本来是迷惑人的洋货而已。这篇小说用西医与机器比喻西学的特征；西学显示为无用的唯物主义，不仅不引起任何道德或精神上的改善，而且它会骗人。在这一点上，比如跟鲁迅《文化偏至论》所表示的意义有些相似。

这个文本显示再现的模式，大致是用比喻的方式。手术的描写是“人面兽心”这种成语的具体表现：把身体打开相当于暴露心里所藏匿的真相。另外，也谈到互文性关系的问题：叙述者直接提到《聊斋志异》里的一个故事（有可能是《毛大福》或《梦狼》：《毛大福》里面，一个良医治病一只病的狼。这里是相反的）。这篇小说也显示明显的文学间关系（*interliterary process*）。它所变现的西医再现属于一种整体的语境：大量地输入与翻译西方（与东洋）的知识和通俗文学，特别是科幻小说（当时中国把它叫做“科学小说”或“理想小说”）。除了第一人称与反话结构之外，《介绍良医》还显示这样的输入成分：叙述者当离奇故事的证明人。像晚清时期很多小说一样，读者能发现一系列带着“西方注意”意义的东

西：气球、电力、催眠术，等等（譬如参见《电术奇谈》；Patrick Hanan, *Chinese Fiction of th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ies*, 第153页）。在《孽海花》的第九回（第一到第二十回1905已发表了）描写这样的情况：大清国大使金雯青坐船到欧洲；在旅途中，听说有一个俄国医生施催眠术于几个中国游客；然后这种技术被介绍为西方现代科学而非魔术。结果，中国腐败的大使试图用它为了勾引一位俄罗斯的姑娘。《介绍良医》中所描写的手术主要参考着一个总体，即科幻小说（无论是翻译还是创作）带来的一系列再现。不一定能找到某一个作品作为唯一的参考资料：譬如威尔斯（Wells）的《莫洛博士岛》（*The Island of Docteur Moreau*, 1896，其实它似乎1948才翻译成中文？）或者雪莱（Shelley）的《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 1818）（梁启超19世纪九十年代得知这部小说，把它作为与唤醒有关的形象，参见石川祯浩，《晚清“睡狮”形象探源》）。最主要的来源（无论到中国后如何被本土化了）是一种想象，以奇怪的手术或做成怪物的移植术比喻科学；然后这种可疑的科学隐喻着西方的某种权力意志——这个问题跟形象学有关联合。

另外，当时的中国通俗文学，也提供一些类似的例子，可以当参考。都是所谓“新小说”的作品。《月球殖民地小说》（1904-1905）（参见David Der-Wei Wang 王德威, *Fin-de-Siècle Splendor*, 第287-295页）也显示一场手术。主人公龙孟华，像凡尔纳（Verne）的人物一样，坐气球飞遍世界；旅途中生病后，其旅伴们送他到孟买（Mumbai）的一家医院，看外国医生“哈克参儿”（Alexander??）。后者给病人诊断：

“这病是急血奔心，是在那里受的大惊恐？”[。。。]哈老拿出一面透光镜，向病人身上一照：看见他心房上面蓝血的分数占得十分之七，血里的白轮渐渐减少，旁边的肝涨得像丝瓜一样，那肺叶一片片的都憔悴得很。看毕，向玉太郎道：“这病形大势尚属无碍，只是须剖开胸膛[。。。]”。

在这一段里引用的词汇，似乎很专门和科学化。其中的一些词汇确实是现代的科学外来词：“心房”（*atrium cordis*），“白轮”（*leucocytes*），“肺叶”（*pulmonary lobe*）。然而，也有几个似科学非科学，除非它们既然是科学词汇，它具体意义也不确定：“透光镜”（请看以下），“蓝血”（“血蓝”这个词存在，*hémocyanine*的意思，不过人类没有）。另外，也有完全不科学而显得“通俗”的一些说法：“肝涨得像丝瓜一样”。同样，“憔悴”也带着某种心理上或主体化的维度。可见，“西方主义”的异国情调追求超过现实与教导上的准确性。作者不把握科学与技术的知识。接着，医生做手术：

自己又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方巾，弹上些药水，覆在龙孟华头上。叫贾西依解开龙孟华的胸膛，自己跨上床去，复把那透光镜照了一番；腰里拔出一柄三寸长的小刀，溅着药水，向胸膛一划，衔刀在口，用两手轻轻的捧出心来，拖向面盆里面，用药水洗了许多功夫[。。。]。贾西依吓得面如土色，抖战战的捧着。哈老又倒了些药水，向那肝肺上拂拭了好一回。然后取那心安放停当，又渗了好些药水。看那心儿、肝儿、肺儿件件都和好人一般，才把两面的皮肤合拢。也并不用线缝，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瓶，用棉花蘸了小瓶的药水[。。。]。措到完了，那胸膛便平平坦坦，并没有一点刀割的痕迹。

这种很奇特的手术，接近于道士施行的某种奇术：所用的机器很像一片魔法的镜子，以它揭露万物的真面目（比如传奇小说中有类似的故事）；“用药水洗”病人的“心”是一种清净祭祭祀的治疗过程，加一种儒家式的更新内心的劝导（参见《大学》的“日日新”）。其实维新派也勉励中国去更新。这篇文本显示的教导维度不在于宣传（非准确的）医学知识，因为这不是它的意图，而是通过某种简单与具体的“通俗化”想象的展示，来再现一种神医做出来的手术。它给予某种意识形态与文学上的期待远景（horizon d'attente）以西方主义的外形。在这一点上，作为文化隐喻的“药水”并不是纯粹的现代技术洋货或西学。这种“本地”或中国的期待远景与小说所展示的寓意（allégorie）纬度有密切的关系。它赋予医学与身体方面的描写以伦理意义。在手术结束后，医生阐述了一种道德生理学的理论：

“你这心想是自己小用坏的。我听见有人说起，中国有种什么文章，叫做八股，做到八股完全之后，那心房便渐渐缩小，一种种的酸料、涩料都渗入心窝里头；那胆儿也比寻常的人小了几倍。所以中国一班的官员都是八股出身，和我们办起交涉来，起初发的是糊涂病，后来结果都是一种胆战心惊的病。我向来行的是医道，并不曾办过什么外交，今日看见先生的心，才晓得这话是不错的。以我愚见，你以后再休做那八股。非独八股不要做，就是寻常的笔墨也以少动为妙[。。。]。”

龙孟华（名字是明显中国的寓意）觉醒过（也是觉悟到）：手术的再现给读者显示出一种教导。其实，由于1905科举制度被废除，文本便完全合乎官方“新政”的政治话语。当新文化运动尚未开展时，新小说已试图表明，文化疾病来自教育制度与教理知识及死板的文体。像上边提起过的《介绍良医》一样，被展示的知识，又是通俗的，非科学以及“前现代”的：它展示的思维方式主要进行一种类比推理的思路，甚至可以说是以“心”这个词所含的多义性做语言游戏。与《介绍良医》相反，外国医生的诊断不被否认或显得滑稽可笑。这说不定是因为这种话语比较符合以某种“中体”为基础的梦到之现代化（龙“梦”华！）。

《月球殖民地小说》里的第三十三回，也展示类似的手术，龙孟华的日本旅伴玉太郎也生病。为了医治他，得“擘开脑壳”。哈克参儿医生又来下手，用神效的药水洗他脑筋。之前（第三十二回），是用“电气折光镜”才能诊断出来人物患的疾病何如状况。重要的在于镜子，意味着启示，揭示真理（如医界镜的标题）：科学的现代性，是由电气与视觉所保证的，在一种文学寓言的形式里。

类似的大脑手术，也可见于《女娲石》（1904）的第十回。女权主义加革命者瑶瑟发现她刚不知不觉被动过手术。“白十字”秘密“社会元”的楚湘云承认她开过一家“洗脑院”，给她动了手术，因为不知道她的身份：“不由得不下手，即时将娘子脑筋解剖出来。却奇怪，那脑筋洁白无垢，不似乱臣贼子。彼时大惊，往娘子身上一搜，搜出贵党知照来。”接着，这种开脑壳的医生职责中国的官僚与文化制度对中国人的脑筋带来的害，类似于《月球殖民地小说》所展示的心脏手术（白十字会也反对着八股文）：

“大凡人有想像，无不印于脑筋。譬如我国官场，采摩的是上司意旨，想望的是阔差好缺。若将那副脑筋解剖出来，其色灰黑，如烟如雾，中间隐隐约约现出一个上司相片，周围筋络交错，好似金钱现影。”瑶瑟将图一看道：“呵呀，不错！”湘云又道：“譬如我国士子，所念的是朱注，所哼的是八股，所模仿的是小題正鹄八铭塾钞，高等的便是几篇时墨。”

思维内容和内心意图的再现，在这里很具体化（开脑子，就能看见它），有意显得很天真，也起到滑稽的诙谐的作用：文本主要试图表示批判的意思。另外，它颇看重“重返真元”这种很古典的原则：“大凡人的脑筋，在初生时候洁白如玉，嫩腻如浆”。只要洗人脑就能恢复它：“若得我国病愈，愿洗四万万脑筋奉答上帝”。可见，楚湘云正模仿当时革命家的话语，也赋予它以一种宗教性的迷信色彩。在第六回中，瑶瑟发现一架科幻的机器，能给人提供一种变成“纯洁精液”的食物：不过它所显示的医学原则又很像内丹或中医所会提倡的。在这一点上，甚至可以说是“传统”中医的网路庞克化（*cyberpunk*）或蒸汽庞克（*steampunk*）版本（这个概念以后才有的）。当然读者也不一定会把它当真。

上面这几个例子，展示出“脑筋”在中国现代文学的想象里充当的重要地位，也参考着在近现代中国医学与再现史中的一种现象：西医输入中国以后，它宣传身体为神经系统所操控的范例。因此，中西医中最大区别之一，在于给予“心”还是“脑筋”以个人精神与感情生活中枢的作用（参见皮国立，《近代中医的身体观与思想转型》）。这些选自晚清通俗小说的

几个例子，在这一方面上或许能显示出对医学的民间知识之某一种中间的状态：大脑的重要性被承认了，同时尚视为具有一种发挥伦理的主体化机能，而不光是客观的有机物质。这部小说有可能呈现了革命性大于改良性的内容。深知在上面涉及到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里，意图也是含混的，模糊的，音调方面，显得更具有革命性超过改良性，但也对于科学的乌托邦有更多的讽刺可能，因此也是对于西方主义加以讽刺。

这些主题与医院的形象很接近：在中国新文学里面，医院经常作为语言或政治上驯服化的寓意，这种文学的形象经常不带批判性而直接被引用（参见丁玲《在医院中》；Pang-yuan Chi and David Der-wei Wang 主编,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Second Half of a Modern Century*, pp. 65-75）。医院体现着一种理想化的乌托邦场所，以现代科学的卫生，作为最显著的特性；它保障个体通过皈依某种集体意识形态的事业而能在道德方面作新人类。在此之前，作为政治现代化计划隐喻的医院形象或卫生主题可以见于不少近现代文献中，特别是在一些哲学家，像谭嗣同、康有为或梁启超等的作品。因此，《月球殖民地小说》显示强调清白与洁净的意思（医院里提供“公用的，洁净的很”的“行李物”，而“不分彼此”；玉太郎梦到月球上，发现一种纯粹的世界）；《女娲石》的“天香院”乌托邦中，机械的食物也“最合卫生”。其实，后者例子很有可能带着讽刺：通俗文学对这些新的再现与话语不一定完全以为然。然而，它们已属于共同与主流的再现；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包括通俗与新文学在内），对这种现代化维度的认同似乎很快变成共识（有很多例子）。或许等到像九十年代作家王小波的《白金时代》之类作品后，方有所改变。

陆士谔（1876-1943，笔名“儒林医隐”）的《医界镜》（1908），则用一种教导的方式，提出一系列卫生方面的教训。这部小说的副标题是“卫生小说”（小说以之为名先发表于1906年；同年也出版了一部《医界现形记》，笔者不知是否一本）。《医界镜》确是一本试图给读者普及一些家常医学知识的小说。读这部小说，可以学到一套实际的知识：庸医与良医如何分；中医的诊断如何进行；庸医用哪一种手段为了欺骗病人而出名；还有很多有关饮食制度、生殖方法（“种子妙法”）、中药处方等等。这部小说之所以很“专业”，是因为陆士谔本来也行过医（中医）。举几个例子。在后面的选段中，某位庸医顿悟梦中接受到一套改善卫生的妙法：

今年杭城内外，又将遭瘟疫惨祸，其故由于街道污秽，一切恶毒之气，酿成微生物，一逢天雨，遂从沟渠流入河内开内，人吃了这水，碰着秽气重的时候，即生疫病了。[。。。]第一要戒不洁[。。。]所以住宅之内，宜时时洒扫，内外衣服，宜常常洗涤，厨房之中，[。。。]那些腐败及隔宿的食物，断断不可入口，坑厕不可接近[。。。]如果血脉偏行，因而饮食停滞，遇事则懒惰因循，种种毛病，亦每从此生出来，宜使身体时时小劳，则元气顺畅，血脉流通，饮食亦易于消化，疾病亦无从生了。[。。。]你须切记在心，除自己奉行，并广劝世人，使人人略知卫生的道理[。。。]。第二要日光，各种的病菌微生物等类，一逢日光即行消灭，放在卧室房总要使太阳光线透明，非但病菌微生物可以除却，而人身内大气得阳光照豁，一切除腐之气自能谢却，新鲜之气常能旺盛[。。。]。三要勤换气，人之一呼一吸摄取空气中的养气[氧气?]，排除体内的炭气，人身气血方能清净[。。。]。（第六回）

这一段似乎来自某一本医学的指南手册：所介绍的现代科学知识显示一定的把握与准确性。然而，这一套外来的现代知识，又显得从属于中医加民间智慧式的本体。

接着，介绍一个骗人布置的例子：一个庸医准备使上海报纸刊载广告，以爱国名义上来卖假药：

“现在支那的人，似文明非文明，似野蛮非野蛮，知识似开非开，内无实际，外竞新说，这等人最容易受欺，目下人人人口头，不是说的人身以脑气筋为重吗？我即乘着这句话，迎机而入，趁这混混过渡的时代，说脑为光天，创立一种补天汁假托西法真传，说西人服之，如何聪明，如何强壮，现在我中国人种孱弱，非大补天元不可。”（第十二回）

又能见到在现代中国再现中“脑气筋”（相当于“脑神经”）当的重要位置。在这里，卫生的主题也归于以上提及过的同样文化语境：卫生纳入一种民族计划的整体（参见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话语中的东亚病夫的形象）。另外，这种非中非西的药物也隐喻着假的文化交流。

在这几个例子中，文本通过医学再现的展示来讨论现代化的主题：如何将中西医联合在一起的问题，意味着如何把西学纳入中国。《医界镜》的地十七回中，直接涉及到这一点。姓吴的年轻医生住在莫夫人家，与她女儿娉娉有秘密关系（本来他们俩的父母早就决定使他们结婚在一起）。其实，在这一方面，这部小说也部分地属于“才子佳人”的类别，这两个任务的故事直接参考着《西厢记》的布局，可以说是一种“医学加爱情”的小说，起码下一个例子会属于类似的类别：

却说吴生自与娉娉好会以后，真是才子佳人，风流韵事。一回娉娉等候夫人睡觉之后，私下来到东厢，与吴生焚香煮茗谈心，看见案上有《全体新论》一部，取过来揭开一阅，见是西人合信氏[Hobson]所著，因问道：“现今中国医学式微，竟无洞烛垣一方人[?]]，所以喜新法者，都推重西学，究竟中西医学，孰长孰短，优劣如何？哥哥医道贯彻中西，试详以告我。”吴生道：“医学能造其精，各有好处，偏信西医者固不好，误信中医者亦不好。”

很有趣的是，这种核心的讨论在浪漫的情境中也会出现。在1851年出版的《全体新论》乃是中国现代医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上面提及过的《女娲石》、《痴人说梦记》中一些人物偶尔也看到类似的教导图像（展示人体、解剖等新知识）：它体现着西学。吴生陈述着一种比较平衡的现代化原则。在这篇选段的下面，吴生举了一个例子，提到洋务派曾文正公（曾国藩，1811-1872）太偏于西方化的取向：“出使西洋”后，“大染欧风”，反对中医，“单吃蔬菜，及牛羊鱼肉之类”，不吃五谷了，结果他的肠胃失衡了（笔者不知是否真有其实??）。依别家医生所见，原因在于“以中人的气体，而学西人的服食，断不相宜”。可见，脑筋与肠胃，当两种医学（即两种文化）之间的冲突之际，甚至作为一种民族身份与文化的标志。之后，吴生继续检查两种医学的长短，也不姑息某些腐败的中国医生。

当时的通俗文学中不同作品会赋予西医以某种肯定或否定。譬如，在《痴人说梦记》（1905）来自“愚村”的主人公贾希仙生病，到了某个岛国，发现那边的岛民很落后（像《孽海花》里的“奴隶岛”一样），它医学不发达，幸亏过去来过这个地方的“美国人”留下了有效的“药水”。与此相反，《老残游记》里的主人公老残，能够唤醒一个被毒害的整个家族，也破案；他使用山上采的中药，因为他去咨询的一家“中西药房”无法提供有效的解毒药。作为维新派的医生，老残既然有关物质方面的问题运用西学与现代科技，然而针对中国人的精神上疾病，不得不实施中医的资源：中医隐喻着需要重建的儒家之道。

这些例子都展示出的中医再现，在某种程度上，或许表示一种通俗化（所谓民间与官方不一定能够分得清楚）的医学知识：它把不同的古今中外医学成分和观念融合在一起。除了西学东渐如何接受的问题之外，这一套医学的再现和形象与当时的官方与非官方一系列的话语和实践有密切的关系。不过，每一个作品对这些主题所显示的立场不一定是一致的，甚至于一个作品里所表示的看法有可能含糊不清：很难确认固定不动的同一性意义，也更难把

一定的立场归于一定的“社会阶级”。无论如何，在某种角度上，这些通俗或副文学的作品起一种政治与科学的一定教导作用。

总而言之，这些例子所显示的医学再现，还是具有几个共通的特点。大致体现出一种中体西用的现象：外来的知识通过某种“本土化”的输入过程才被“消化”。此外，这些现代文学里的医学再现，似乎包含着对于维新计划与西学一定程度上的接受，同时也不会抛弃所有的中学：这种话语要等到新文化运动才会大量地继续展开。晚清地新小说在语言、形式与结构方面上也显示类似的特征，同样地追求混合式、杂糅的现代化。在这之后的新文学更加强调西方主义而抛弃这种现代化的谋划。然而，把这些小说视为“保守”会不够适当，因为这种角度包含着之后发生的“新文化”。